纪念李大钊诞辰 130 周年

大钊先生 130 年祭

杨　河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 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也是壮丽的。他和当时聚集在北京大学的那一批中国优秀的先进知识分子一道,在努力使自己走在时代前列的同时,铸造和践行着党的初心和使命,也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传播和中国共产党最早活动的重要基地,使北京大学的发展与党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北京大学担负着文化守正创新的历史使命,砥砺前进中,大钊仍然是我们的先生,永远的先生。

关键词: 李大钊;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民族复兴;北京大学

中图分类号:B 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9)06-0005-11

李大钊字守常,1889 年 10 月 29 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沱村的一个小康人家,地临渤海,靠滦河,历史上常十年九涝。

幼小时,父母先后去世,祖父疼爱有加,从小教识字,七岁送至本村私塾习读“四书、经、史”之类,塾师为他起学名耆年,字寿昌,他年龄最小,学习最好,被塾师视为生平最得意的学生。

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又分兵四路扩大侵略,大钊目睹侵略军对中国人民的蹂躏,心灵留下极深烙印,萌生对旧政府的不满,常和同学谈些如何改变现状的问题。后读太平天国运动的故事,深为感动,表示:“我长大了一定要学洪秀全,推翻清朝皇帝”,遂发愤读书,寻求救国救民的良策,“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

1907 年,祖父去世,家境日益困难,他“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不等中学毕业,就到天津投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改名大钊。学费所需,皆赖夫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当时,中国思想界“新学”与“旧学”正起论争,在学习法政诸学和英语、日语过程中,他大量阅读了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思想家如卢梭等人的著作,开始树立民主主义思想。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的活动日趋广泛,法政专门学校的史地教员白亚雨就是同盟会重要成员,其言行对大钊影响很大。辛亥革命爆发后,白亚雨奔走于京、津、滦州、张家口一带,与同事发动滦州起义,失败后被捕殉难,赴刑场时英勇不屈,立而不跪,昂首宣称,“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杀则杀耳,何迫辱为”! 大钊对其异常尊敬,视为楷模,后多有文章悼念不已。

1913 年 5 月,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冬季动身,船过黄海,落日狂涛,风云涌动,凭栏远眺,追念起甲午海战中为国殉身的志士,他感慨道:“怒潮哀咽,海水东流,若有殉国亡灵凄凄埋恨于其间者。”

到达日本后,入早稻田大学政治学本科,开始接触和学习关于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其中河上肇(1879—1946)写的有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和幸德秋水(1871—1911)写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些著作,对他的影

收稿日期:2019-10-01

作者简介:杨河,男,江苏徐州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响较大。

1915 年 1 月 18 日,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递交了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置于日本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留日学生成立学生总会,推大钊为文牍干事,写就《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通电,号召国人“举国一致,众志成城”,保卫“锦绣之江山”,得到国内的热烈影响。

12 月 12 日,袁世凯倒行逆施,公然宣布推翻民国,恢复帝制,激起全国众怒,蔡锷等到云南组织“护国军”,举起讨袁大旗,各地纷纷响应。留日学生总会积极为之代筹军饷,大钊负责组织宣传工作。

1916 年从日本横滨回上海,着手筹办《晨钟》报,在 8 月 15 日创刊号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要以“晨钟”之声“为青年之舌”,以“厚青年之修养,畅青年之精神,壮青年之意志,砺青年之气节,鼓舞青春中华之运动,培植青春中华之根基。吾乃高撞自由之钟,以助其进行之勇气”。在这年 9 月 1 日《新青年》2 卷 1 号的《青春》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积尘重压”之中国,其未来的出路,“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凡以冲决历史之梗桔,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等,固莫不唯其青年是望矣”。因此,青年应“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图圈”,“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青春》表达出一种朝气蓬勃的进化论的青春历史观,是《新青年》早期鼓舞青年反对封建主义的名文,对前期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影响颇大。

正当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蓬勃发展之际,1917 年 11 月 7 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苏维埃政权建立。消息传到中国后,正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大钊基于在日本留学期间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很快就看到了十月革命对于世界历史发展和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意义。1918 年 7 月 1 日,他在《言治》季刊第 3 册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指出俄国十月革命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法国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之上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十月革命则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着世界革命之彩色者也。时代之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质自异”。预言“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化,其萌芽即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泊之中”,“唯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

是时,大钊已经由章士钊推荐,接替章担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到职后即对图书馆进行整顿,将图书馆扩大到二十一个书库和六个阅览室,购进不少有关马克思主义书籍,除外文版外,还有一些早期的中文译本,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河上肇著,李达等译),《唯物史观解说》(郭泰著,李达译)等。此时北京大学已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大钊和鲁迅等都参加了《新青年》编委会。为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他与陈独秀又创办了《每周评论》。《每周评论》与改版后的北京《晨报》副刊,后来成为了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阵地。

这年 8 月,毛泽东陪送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人员来到北京,经杨昌济教授向大钊推荐,10 月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报阅览室任助理员,与谭平山等人一道,成为大钊指导下的新闻研究会的会员。毛泽东后来在延安对斯诺回忆道:“我在北大当图书馆助理的时候,在李大钊领导之下,我就很快地发展,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

11 月 15、16 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举办讲演会,蔡元培讲《劳工神圣》,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讲,这篇演讲稿和续写的《Bolshevism 的胜利》发表在年底出版的《新青年》5 卷 5 号上。

这两篇文章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高度评价了庶民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指出:“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是马客士(即马克思)的功业。”“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 Bolshevism 战胜的旗帜。到处所闻的,都是 Bolshevism 的凯

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出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 年 1 月 5 日,《每周评论》发表了大钊撰写的社论《新世纪》,提出“从今以后,生产制度的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动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

这些文章中,大钊已经从进化论转向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中国和世界的问题,初步具有了共产主义思想,这与他对中国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被剥削状况和历史地位的了解和认识密切相关,发表在《每周评论》第 12 号上的《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他揭露了工人在资本家和包工的压迫下的悲惨境况,“他们终日在炭坑里做工,面目都成了漆黑的色。人世间的空气阳光,他们都不能十分享受”,“工人的生活,尚不如骡马的生活,工人的生命,尚不如骡马的生命”,他们才是改造社会的根本力量。随后他在《晨报》的《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提出:“要想把现代化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

5 月 1 日,《晨报》副刊出了“劳动节纪念”专号,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纪念这个全世界劳动人民自己的节日。大钊发表了《五一节 MayDay 杂感》,指出这是工人的“直接行动”取得成功的日子。三天以后,五四运动爆发,体现的正是广大青年学生反帝反封建的“直接行动”,大钊的文章,在一定意义上是五四运动的前奏。

五四运动造就了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这个重大转折的两个基本条件是: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大钊对于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集中于此。

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上,大钊始终是走在前面的重要旗手。

其一,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五四运动发生的第二天,大钊利用纪念马克思诞辰 101 周年之际,在《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所刊登的陈博贤翻译的河上肇的《唯物史观研究》,标志着马克思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开始,这篇文章后来又被大钊收入《新青年》6 卷 5 号“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此后,《晨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新青年》杂志、《建设》杂志、《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报刊相继发表了许多介绍和宣传研究唯物史观的文章。

《新青年》6 卷 5 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还刊登了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另一部分发表于第 6 号上),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有机的体系,可分为三大部分,即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经济论)和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论”论述了“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马克思的“经济论”论述了资本主义的“脚下伏下了很多的敌兵,有加无已,就是那无产阶级。这无产阶级本来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就是他”。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因为“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这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尽管还有着一些不够准确的地方,但是被公认为“五四”期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最为重要的著作。

1919 年 12 月,大钊在《新潮》2 卷 2 号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又于 1920 年 1 月在《新青年》7 卷 2 号上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运用唯物史观解读思想文化的变化,指出:“马克思一派唯物史观的要旨,就是说: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在物理上物质的分量和性质虽无增减变动,而在经济上物质的结合和位置则常常变动。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所以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经济变化物质变化,而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近代以来,“中国的农业经济,既因受了重大的压迫而生动摇,那么首先崩颓粉碎的,就是大家族制度了。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伦理,都以大家

族制度为基础,而以孔子主义为其全结晶体。大家族制度既入了崩颓粉碎的运命,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

这些看法,体现了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深化。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一些青年学生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这是大钊所期望的,遂予以积极的引导,当时就读北大法学院的学生朱务善回忆道:“我认识守常同志是在 1920 年春天,……我受了当时‘新思潮’的影响,一次到图书馆去找守常同志谈话,请他介绍几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非常高兴的接受了我的请求,……同我谈了不少学术与思想方面的问题,谈完话,他从桌旁一个堆满书刊的书架上拿出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给我,要我看后提出意见,又给我几本河上肇著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一本英译的列宁写的小册子。他送我出图书馆的时候还说:‘这本英译的小册子你看完后交还给我,不要转借他人。’因为那时谁保存列宁的著作,谁就有布尔什维克的嫌疑。第一次和守常同志见面,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确是热爱青年,特别是热爱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青年。”

其二,站在捍卫马克思主义斗争的前列。任何新思想的兴起,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总要经历思想界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是如此。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原来的统一阵线发生了分化,围绕思想理论方面一些原则问题的论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其中重要的是三次,论争的核心问题是改造中国的道路问题。三次论争中,大钊都站在了斗争的前列。

第一次是“问题与主义”的论争,焦点是要不要主义?

1919 年 7 月 20 日,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指出:“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首先发表文章反驳胡适观点的是《国民公报》编辑蓝公武,他指出了社会共通性的问题是革命的问题,强调在文化落后的民族和国家宣传主义的重要性。1919 年 8 月 17 日,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指出:“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因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哪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所以现代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做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

针对胡适对主义“根本解决”的责难,大钊指出:“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

第二次是“社会主义问题”的论争,焦点是要什么主义?

1920 年 9 月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主张中国社会改造要重在发展实业,兴办教育,“暂不主张社会主义”,立刻受到了一些人的响应,首先站出来的是《时事新报》的主编张东荪。

在陪同罗素到湖南等地演讲后,张东荪在当年 11 月 5 日于《时事新报》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认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是穷到极点了。……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

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国家主义甚么无政府主义什么多数派主义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

张东荪的文章发表后,受到了陈望道、李达、邵力子等的质疑和批评,12 月 15 日,张东荪在《改造》第 3 卷第 4 号上又发表了《现在与将来》一文,更为明确地指出,由于中国社会十分落后,劳动阶级尚未形成自觉意识,不具备搞社会主义的条件,现实性的道路是资本主义。梁启超进一步发挥张东荪的观点道:“以社会主义运动之立场而论,欲此主义之传播与实现,不能不以劳动阶级为运动之主体;劳动阶级不存在之国家,欲社会主义之实现,其道无由。而劳动阶级之发生,恒必与资本阶级相缘,故必有资本阶级,然后有劳动阶级;有劳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运动有所凭借。”因此,与其仓促实行社会主义,导致社会动荡的游民运动,不如选择“利在目前害在将来的”资本主义。

针对张东荪、梁启超的看法,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等进行了反驳,大钊指出:“在现存制度下谋求实业的兴盛,实质上就是要使我国的统治阶级与各国的资本阶级结合起来,这样只能加强统治阶级的力量,而绝不会带来其他任何好结果,这是显而易见的。”“要问中国今日是否已具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须先问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实现社会主义的倾向的经济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致社会主义,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痛苦。中国国内的劳资阶级间虽未发生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不可。”

第三次是“无政府主义问题”的论争,焦点是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1919 年 5 月,北京大学学生黄凌霜在《新青年》第 6 卷第 5 号发表《马克思主义批评》,批评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认为“社会主义,不应当压制个人的自由。社会民主党的政府,又要设立什么工农民兵,这不是压制个人的表征吗?”此后,《奋斗》《新潮》等杂志又连续发表了若干篇批评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公开了与马克思主义的论争。

1920 年 9 月开始,《新青年》先后发表了陈独秀的《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下品的无政府党人》以及其他人撰写的批评无政府主义的文章,1920 年 11 月出版的《共产党》,从第 1 号到第 5 号,先后发表了李达、施存统和张闻天等人的文章,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方面与无政府主义展开了论争,既肯定了无政府主义者在革命问题上的积极态度,又批评了他们在国家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对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做了重要的阐释。大钊在《少年中国》2 卷 7 期上发表《自由与秩序》,批评无政府主义的“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他说:“试想一个人自有生以来,即离开社会的环境,完全自度一种孤立而岑寂的生活,那个人断没有一点的自由可以选择,只有孤立是他唯一的生活途径。”“真正的自由,不是扫除一切的关系。”“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

这次论争的重要意义正如刘少奇在 1939 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时所指出的:“在起初各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无政府主义是占着优势的。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到处都与无政府主义的拥护者争论着、斗争着。马克思主义直至在各方面克服无政府主义以后,并与中国的工人运动、人民反帝运动结合以后,才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雄厚的力量。”

三次论争,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准备了思想理论条件。

其三,率先在中国高校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1920 年 7 月 8 日,北京大学评议会全体通过将“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以后,10 月初,大钊即先后在北大历史系开讲“唯物史观研究”和“史学要论”,在经济系开讲“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课程,

在法律系开讲“社会主义”等课程,同时,还在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兼课,在这些课程中,大钊将唯物史观运用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研究,指出:“新历史观及本着新历史观编成的历史观则不同,他教吾人以社会生活的动因,不在‘赫赫’‘皇矣’的天神,不在‘天亶’‘天纵’的圣哲,乃在社会的生存的本身。”“这种历史观,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现了我们的世界,发现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这些讲授,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开了先河。

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上,大钊是重要的筹划者、组织者和创立者。

早在 1920 年 3 月,大钊同邓中夏多次商议后,就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尔格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在护送陈独秀为了避免军阀迫害离开北京到上海的途中,大钊和陈独秀探讨了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并商议在北方和南方分别准备,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20 年 4 月,在共产国际的安排下,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全权代表维经斯基(中国化名吴廷康)等来华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的情况,先在北京会见了大钊,在大钊主持下,与北京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进行了座谈,并就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与大钊交换了意见,后经大钊建议,维经斯基等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继续探讨建党事宜,经过考察,维经斯基等认为中国已经具备成立共产党的基本条件,便予以积极促进。

1920 年 5 月,陈独秀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城市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 月与李汉俊、余秀松、施存统等具体商议成立党组织,在征求大钊意见后,定名为“中国共产党”,8 月左右,在北京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上海首先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即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沈玄庐、俞秀松、陈望道、邵力子以及后来加入的沈雁冰、李启汉、沈泽民等,陈独秀为负责人。11 月,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要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

10 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成员有:李大钊、邓中夏、高尚德、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及后来加入的张太雷、何孟雄、朱务善等,大钊为负责人。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多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

在上海和北京党组织的联络和推动下,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汉,王尽美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人在广州,也在 1920 年秋至 1921 年春先后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此外,周恩来、张申府、赵世炎、施存统、周佛海等也分别在法国和日本成立了旅法和旅日中共早期组织。

1921 年 3 月,大钊公开呼吁创建工人阶级政党,指出:“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 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付托!”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13 名代表出席大会,代表着全国 58 名党员,7 月 30 日晚,由于一名陌生男子突然闯入会场,引起大家警觉,会议中止,最后的一天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纲领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党的奋斗目标,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组建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它不仅区别于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也区别于当时主张走议会道路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毛泽东在新中国即将诞生时回顾道:“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指出:“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

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由于一些其他事务,在北京的大钊和在广州的陈独秀都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但是北方各地党组织的创建都和大钊的指导有密切关系,南方各地党组织的创建也都和陈独秀的指导有密切关系,据斯诺记载,毛泽东曾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在这个组织中间占主要势力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著名的文化界领袖。”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大钊为党的理论建设、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不懈努力,其中,工人运动和与国民党的合作是他工作的重要方面。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从诞生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在工人中宣传自己的主张,教育、团结工人进行革命斗争并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自己。大钊深知工人运动的重要性,指出:“旷观过去的社会历史,别的阶级都丧失其意义;唯独产业者阶级,其意义反以逐渐增加,吾人不能不由这种事实,断言产业者阶级毕竟是最大重要的阶级。”在中国“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在1920年5月1日《新青年》(7卷6号)的“劳动节纪念号”上,大钊发表了《“五一”MayDay运动史》,号召“中国的劳工同胞”“认今年的五一节作一个觉醒的日期”,知识分子不要空喊“劳工神圣”,应到“劳工”中做发动群众工作。1922年5月1日,他在《晨报》副刊发表的《五一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中指出:“五一是工人的日子”“是资本家的厄日”,代表中国工人阶级提出了反对国际军阀财阀的压迫、否认军阀制度、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男女同工同酬等对内对外的政治经济要求,对推动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20年1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通俗小报《劳动音》,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的革命道理;1921年7月北京地方党组织在他的领导下,又创办了《工人周刊》,介绍国内外劳工消息,报道各地工人生活状况,启发工人阶级觉悟,鼓动组织工会进行斗争,深受工人欢迎。1922年5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上海迁到北京,《工人周刊》成为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的机关报,在宣传马列主义,指导全国工人运动特别推动北方地区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了发动工人运动,1920年4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派出邓中夏等率领平民教育讲演团,前往京汉铁路上的重要车站长辛店,向工人宣讲革命道路,1921年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经过努力,长辛店成为了早期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基地。

1921年春,小组成员赵子健来到郑县(今河南郑州),任郑州铁路职工学校教员,在工人中传播新思想,发动、组织工人。大钊也亲自来给“京汉铁路职工学校”上课,他在黑板上写了个“工”字,又在“工”字下写了个“人”字,两个字连在一起就成了“天”,他说,“你们工人可不矮呀,工人够上天那么高呀”,“工人的前途远大得很呢”!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党在北方的工作,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在他的领导下,北方的工人运动打开了新的局面。1922年4月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吴佩孚掌握了北京政权。为了收买人心,吴佩孚在“保护劳工”的幌子下实行了一些笼络工人的政策,大钊利用吴佩孚与交通系之间的矛盾,派共产党员何孟雄等以铁路密查员的身份前往京汉、京奉、京绥、正太、陇海、津浦北方六条主要铁路沿线从事革命活动,建立工人组织。经过艰苦努力,这6条铁路都建立了工人组织,尤其是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发展迅速,到当年底已建立了16个工人俱乐部,在此基础上,1923年2月1日在郑州成立了京汉铁路工人总工会。

1922年8月24日,长辛店铁路工人举行大规模罢工,拉开了北方工人罢工高潮的序幕,不久,10月13日、23日、27日,唐山铁路工厂工人、开滦五矿工人和京绥路车务工人又先后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罢工,罢工由最初的经济斗争逐渐转向反帝反军阀的政治斗争。大钊亲自领导了开滦五矿3万余工人的反帝大罢工,罢工前,他亲自同工人代表谈话,讨论斗争策略和方式,罢工中,他发动北京大学学生成立“北京开滦矿工罢工经济后援会”,向社会各方募捐援助罢工工人,至11月又发表宣言,揭露“洋资本家”压榨工人的种种罪

行。这次罢工坚持 20 天,最后由于反动军阀政府勾结英美帝国主义共同镇压而失败。但是,罢工提出了“打倒外国资本家”的口号,这是继香港海员罢工之后,又一次规模很大的直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国内国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23 年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大钊参与了这次罢工的领导工作,2 月 4 日京汉铁路工人总同盟罢工开始后,他与陈潭秋、施洋等罢工领导人多次联系,商议罢工要事。“二七”惨案发生后,他一方面愤怒指责军阀暴行,积极进行善后工作,设法营救被捕的党员和工人;另一方面鼓励大家在中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时,看到光明的前途,这年 12 月 20 日,他在北京大学发表题为《艰难的国运和雄健的国民》的演讲,指出:“我们的扬子江、黄河,可以代表我们的民族精神,扬子江及黄河遇风沙、遇见山峡都是浩浩荡荡的往前流过去,以成其流滚滚,一泻万里的魄势。目前的艰难境界,哪能阻抑我们民族生命的前进。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的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

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从“二七”血案中进一步认识到,没有强有力的同盟者,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是不可能的。

1921 年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经大钊介绍后在广西桂林同孙中山见面,商谈了扩大国民党和建军等问题,回国之前,马林与大钊交换了关于联合国民党问题的意见。1922 年 5 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7 月召开的党“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这两个文件根据党在当前历史条件下的最低纲领即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任务,既充分肯定了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的历史地位,也真诚批评了它对内对外政策的动摇性,表达了邀请国民党等全国革新党派一道,建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联合战线的愿望。8 月,马林重来中国,带来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指示。为此,中共中央于 8 月下旬特别召开了杭州会议,形成了与国民党合作的议决。

杭州西湖会议后,大钊受中央委托,专门到上海与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热情地接待了他和同去者。大钊在《狱中自述》第三稿中写道:“大约在四五年前,其时孙中山先生因陈炯明之叛变,避居上海。钊曾亲赴上海与孙先生晤面,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孙先生与我畅论其建国方略,亘数时间,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是为钊献身于中国国民党之始。”在《自述》的初稿中,还讲到,“先生与我等畅谈不倦,几乎忘食”。

在交谈中,孙中山从学识渊博、信仰坚定的大钊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感受到当前“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的危机,意识到注入共产党这样的新血液的重要性,此后,开始了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加快了联俄联共的步伐,大钊作为其间的重要纽带,得到了孙中山的充分信赖。

1923 年 1 月,苏联特使越飞来沪,与孙中山商讨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军以及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问题,孙中山邀请李大钊参加了为时 6 天的孙文越飞会谈,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于此交往中,大钊与孙中山之间建立起了真挚的革命情谊。

针对共产党内一些同志对国共合作前途的疑虑,大钊在 1923 年四五月先后发表《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和《实际改造的中心势力》两文,指出,“中国现在很需要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国民党应该有适应这种需要,努力于普遍全国的组织和宣传的觉悟”。尽管国民党现在由于种种问题还显得的实力很不足,但是“这个团体尚有容纳我们考虑问题的包容力。而且孙文氏具有理解人们主张的理解力”。这两篇文章既有助于说服党内同志,又有助于鼓励孙中山及国民党改组派。

1923 年 6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钊出席会议,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 1923 年 1 月 12 日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现国共合作,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

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亲自确定大钊作为北京地区特别代表出席，并以主席身份指定大钊为大会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报告，并印发了《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驳斥了国民党右派的“跨党”等谬论，阐释了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目的和意义，受到了孙中山及其左派的支持。孙中山在这次会议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最终确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大钊和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共产党人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自此，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共同努力而得来的国共合作，终于正式建立，这就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做了准备。

1924年6月，根据中央的安排，大钊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后，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继续留苏工作，11月回国以后，担任中国共产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与赵世炎、陈乔年等一起，领导整个北方的革命斗争，同时，还负责国民党北方地区的工作。

在大钊生命的最后这两年多的日子里，一方面，领导北方党组织继续推进北方地区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运动，先后组织领导了多次斗争，其中最重要的是1925年6月北京市各界群众抗议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的反帝示威大会和1926年3月18日反对日、英、美等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在斗争中教育和锻炼了群众，提高了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领导北方党组织依靠共产党员和国民党的左派，团结中间派，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斗争，其中最重要的是反对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清党”阴谋，提出“将革命交给左派”和争取冯玉祥的倾向革命的国民军，促成“五原誓师”，从而壮大了革命力量，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这些斗争，矛头直指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特别是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引起了其严重的恐惧和不安，1927年4月6日清晨，奉军及所谓“京师警察厅”在帝国主义“公使团”的默许下，出动了警察、侦探、奉天宪兵共三百余人，公然违犯国际公法，包围了大钊同志避居的苏联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等进行大搜捕。

大钊被捕以后，在监狱中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在多次严刑拷打中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在“供词”中坦言：“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励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当时一家报纸报道大钊受审迅时情况说：“李着灰长袍，青布马褂。满脸鬓须，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为马克思学说崇信者，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晓云云。”就连当时不赞同革命的《社会新闻》也不得不肃然起敬，写道：“有廖仲恺不屈不挠的精神，为人又热情勇敢，有气节，有操守，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李大钊迨其人也。”

1927年4月28日上午，大钊等20人被秘密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后院杀害，他第一个走上绞刑台，神色未变，从容就义，年仅38岁。

大钊的死是壮烈的，又是十分令人惋惜的，他却是早有准备的。他曾以《牺牲》为题写文：“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哀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鲁迅在广州听到大钊就义的消息后，感慨道：守常先生真是临危不惧。在滔滔的逆浪中，他昂然挺立，真不愧是革命的中流砥柱。

大钊逝世以后不到4个月，中共中央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面对着新老反动军阀对革命的绞杀，毛泽东后来追溯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到、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两个多月以后，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

的工农革命军到达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中国革命的中心工作完成了从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移，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新的道路。

经过 22 年的浴血奋战，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走进了社会主义，大钊当年所预言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中国成为现实。

又经过 70 年的艰苦奋斗，历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经改革开放，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大钊所期待的“谋中国民族之解放”的伟大复兴迎来了光明前景。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这个初心和使命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在当时那个黑暗的中国，大钊他们这一代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如同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在这片土地传递，驱散着阴霾，锻造和践行着党的初心和使命，铺垫出中国光明道路的基石。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这个认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得到了验证、丰富和发展。近百年中国共产党全部历史的根本经验，就是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近百年中国共产党全部历史的根本成就，就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这是最可以告慰大钊的，也是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的。

大钊是北京大学的先生，他是在蔡元培校长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基本方针改革北大之际来到北京大学的，先做图书馆主任，后做教授，北京大学是他的家。他与当年聚集在北京大学的那一批中国最优秀的先进知识分子一道，在努力使自己走在时代前列的同时，也使北京大学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基地，孕育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北大精神，使北大的发展与党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他书写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对联，既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也体现着那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精神追求、道德自觉和责任担当，内含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文化积淀，这副对联，已经成为今天北大师生的座右铭。他要求北京大学“从学术的发明上预备将来的伟大的纪念品”，认为“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既是他对大学使命的真实理解，也体现着那一代先进知识分子对于中国近代落后的深刻反思，这个要求，已经内化在今天北大“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中。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继续推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北京大学担负着文化上守正创新的历史使命，砥砺前行中，大钊仍然是我们的先生，永远的先生！

大钊先生千古！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3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Mr. Li Dazhao

Yang He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Li Dazhao was one of the earliest disseminators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one of the important found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is life was transient but magnificent. Together with a group of Chinese outstanding advanced intellectuals who were then gathered at Peking University, he built up the Party´s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 and put them into practice, while working hard to keep himself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times. He turned Peking University into the center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which was the original place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the important base for the earliest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for the earliest activiti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ince then, the developm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has been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future and destiny of our Party, our country and our nation. At presen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into a new era. In the course of persisting in and develop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triving to achieve our two centenary goals, Peking University is charged with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cultural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Mr. Li Dazhao remains our instructor forever.

Key words: Li Dazhao (李大钊), Marxism,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y 4th Movement, national rejuvenation, Peking University

(责任编辑　　李　铄)